

浙江社会科学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2023.8



CS 扫描全能王
3亿人都在用的扫描App

-
- 4 农村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农民生活质量:机制与事实
.....王凤婷 王 浩 熊立春
- 15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包容性绿色增长: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李治国 李兆哲 孔维嘉
-
- 25 道德理由在司法中的运用
——从指导性案例切入.....郭 忠
- 35 法律价值渊源的人性审视陈亚飞
- 43 环境人格权:从权利证成到保护路径王 佳
-
- 52 “网络舆论审判”:变局时代中的非正式控制及制度因应 ...赵时雨 董敬畏
- 62 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的张力与论争王国勤 王代月
- 71 数字技术与慈善事业的转型发展周 俊 刘辰玥 周玉芳
-
- 80 传统保障、养老保险与农村居民的养老担忧度 ...徐 强 张开云 周 杨



90 流动人口卫生服务协同供给的逻辑机制与测度路径

——基于扎根探索与复合系统的混合研究

.....于海燕 蒋堃源 费钺钺 俞林伟

101 真理的理念表征:本雅明“星座”概念的学理阐释及其方法论意义 ...郭 广

108 从神话叙事到语言叙事:神性、理性和诗性陈双泉 马 昱 朱光亚

115 汉语本体论研究

——中西方语言哲学的存在范畴观陈 伟

·浙学研究·

122 浙学与实学的互诠互动张宏敏

129 智媒时代传统文化典籍何以活化?俞晓群 施麟麒 王建华

136 红色旅游与公众国家认同的文化逻辑杜兰晓 丁国浩 高长江

143 晚明以降戏曲活动中士人与伶人的思想抵牾与精神离合杨金柱

151 统一战线思想的溯源与解码

——西湖会议的时局分析与历史影响胡天生 房维维

156 本期英文提要(ABSTRACTS)

本期执行编辑 刘 洋



数字技术与慈善事业的转型发展^{*}

□ 周 俊 刘辰玥 周玉芳

内容提要 数字技术对慈善领域的全面渗透使重新思考慈善事业中“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的关系成为必要。作为对传统慈善科学精神不足的回答,科学慈善从价值和实践两个层面推动慈善关注社会进步和加强绩效管理,为慈善事业注入了科学因子。数字技术应用实现了对慈善的全方位赋能,极大地拓展了慈善的领域和功能,有效提升了慈善效益,使科学慈善步入黄金时期。然而,科学慈善过于强调科学精神而忽略了慈善应有的“温度”,带来数字鸿沟、数字失信和数字冷漠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慈善的人道主义色彩。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科学慈善转向寻求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相平衡的“数智慈善”提供了契机。在迈向数智慈善的进程中,要着重处理好技术应用与制度建设、过程管理与结果评价、集中化与多元化三组关系。

关键词 数字技术 人道主义 科学精神 科学慈善 数智慈善

作者周俊,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刘辰玥,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博士研究生;周玉芳,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18)

DOI:10.14167/j.zjss.2023.08.008

一、问题提出

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慈善事业无法置身事外。21 世纪初期,受经济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慈善组织纷纷走上数字改革道路。2010 年前后,已有 130 多年历史的联合之路(United Way)开始数字革命,通过互联网科技与捐赠者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了解捐赠者的意向,进而帮助他们完成慈善项目。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的慈善组织开始搭建数字平台,开启数字传播与网络筹款。2015 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99 公益日”网络募捐活动,为互联网慈善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慈善事业在动员公众参与、创新捐赠方式、提高慈善资源运作效率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在数字技术深刻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需要思考数字技术为何能够被快速应用于慈善事业及其对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层次影响等问题。遗憾的是,在纷繁热闹的数字化转型中,对慈善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应用的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对数字技术影响慈善事业发展进程的研究不足。鉴于此,本文拟通过一种历史性视角讨论数字技术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原因、路径和限度,以厘清数字技术与慈善事业发展的关系。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本文根据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在慈善事业中此消彼长的程度,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科学慈善在欧美的兴起为一个关键事件,将迄今为止的慈善事业划分为以人道主义为主导的传统慈善和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科学慈善两大阶段。其中,科学慈善又被划分为科学慈善的兴起和数字赋能慈善两个子阶段,后者以 21

^{*} 基金项目:本文受 2023 年浙江省社科规划专项重大课题“健全新型慈善体系研究”资助。

世纪初慈善组织开始引入数字技术为标志。本文在这一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基本场域,但需要突破当前数字赋能慈善的局限性,进入更加注重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平衡发展的数智慈善阶段。

表1 慈善事业与人道主义、科学精神

阶段划分		人道主义	科学精神
传统慈善		强	弱
科学慈善	兴起阶段	较强	较强
	数字赋能阶段	较弱	强
数智慈善		强	强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二、传统慈善的不足与科学慈善的兴起

慈善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行为之一,代表着人的良知,彰显人性光辉,是衡量一个社会、民族的道德指向与人文情怀的重要维度,其核心特征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①。所谓人道主义,是指将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通过关注苦难和拯救生命等方式行善或改善人类状况^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慈善一直以人道主义的面貌存在,是人道主义在民间社会的实现形式,这一漫长的时期可以称为传统慈善时期。传统慈善的人道主义特征突出地体现在慈善目的和行善方式两个方面。

一方面,传统慈善的目的是纾解个体苦难。中国传统慈善主要以儒家的“仁爱”思想为基础,强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和宽以待人、仁者爱人的情怀,之后经历漫长岁月的传承和融合,形成了以扶贫济弱和困难帮扶为主要内容的极具特色的中国慈善传统^③。西方慈善根源于以“博爱”思想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受其后发展起来的“罪富”思想与互济精神的深刻影响,其目的是获得个人救赎和解救“基督的穷人”,主要关注不幸者^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传统慈善主要关注鳏寡孤独贫病废疾之人,具有目标单一化和对象个体化、碎片化等特征。

另一方面,传统慈善的方式多为捐赠和互助。中国自秦汉至明清一直处于农耕文明社会,生产力有限但灾害频仍、救助需求多^⑤,因此传统慈善主要解决受助人即时的困难,鼓励邻里互助和家族共济,是一种“输血型”消极救助。受宗教文化和

互济文化的影响,西方传统慈善也主要以宗教捐赠、救济和互助服务的形式进行。中外传统慈善都具有帮扶救助和养济特征,采取的是最为朴素、最直接的助人和互助方式,最贴近弱者需要。

可以说,传统慈善正是基于人类本能的同情与怜悯之心,在宗教或哲学思想的推动和支撑下成长为一项悠长的人道主义事业。这种慈善在获得普遍赞誉的同时也长期面临批评。批评者一是质疑传统慈善在资源利用方面的低效;二是认为传统慈善关注的焦点是施助人,没有给予受助人足够的关注;三是对传统慈善之于社会进步的意义表示怀疑,认为这种缓慢的改良路径无法满足社会变革需求。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到来,大机器生产导致城市工人大规模失业,而圈地运动则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社会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失范现象频发。此时,仅仅依靠传统慈善已经无法满足社会救助和社会进步的需求。^⑥因而,针对传统慈善的批评更为集中和猛烈,重新凝结和定位慈善功能、在慈善中添加理性因子的工作也慢慢开启。

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劳工运动兴起、阶级冲突不断,各种关注社会平等的改良主义和激进思潮从欧洲传入或从美国的学院中产生,这些变化反映到慈善事业中,就是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机制和行政规范^⑦。具体而言,在慈善事业中一直存在“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两种观念。在当时的进步人士看来,前者只是人道主义的朴素反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因此提出要发展“科学的公益事业”,主张对帮扶对象的情况和需要进行切实的调查,以对症下药,不滥施慈善。当时美国社会对贫困成因的认识有两种倾向,一是认为贫穷来自懒惰,二是认为贫穷是由社会机制导致的。尽管看法不同,但两种倾向都主张在慈善中增强科学性,只不过前者将重点放在对穷困者真实需求的挖掘和救助效果的评估上,而后者则重点关注从制度上进行社会改良,呼吁普及教育、解决种族问题和改进社会福利政策等。在这种共识中,科学慈善运动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注重管理专业化、程式化和系统化的科学

管理应运而生,科学慈善获得了更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有力的工具支撑,也因此取得了长足进步。

从整体上看,肇始于美国的科学慈善主要从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在价值和观念维度上,科学慈善主张从传统慈善转向公益慈善,强调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和授人以渔。虽然慈善自始与解决社会问题相关联,但在漫长的传统慈善时期,受物质基础、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局限,这一旨趣难以得到申张。科学慈善运动旗帜鲜明地宣扬公益,将公益定位为解决问题,将慈善限定为救助穷人,在公益与慈善之间划定边界,同时也催生了“公益慈善”概念。这实际上拓展了慈善的边界,使慈善不仅关注穷人而且关注社会福祉,具体体现为强调运用科学的手段以公平正义的方式进行财富资源分配,以保障个人权利和增进各阶层福利^①。

二是在实践维度上,科学慈善呼吁将专业技能、组织管理和战略等要素引入慈善领域,推动科学技术与慈善相互吸纳,以促使传统慈善向理性化、组织化和专业化方向转型^②。在行为实践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对慈善助人的标准化和规范性有了更高的要求,期待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③,注重发现受助者真实需求、慈善行为的影响力和时效性^④以及对慈善活动的评估与后续跟踪,认为这可以解决传统慈善中的捐赠者视角和效率不足等问题。在工具方法方面,科学慈善在早期发展中多关注“社会疗救的科学”“捐赠的科学”,推崇“管理的科学”和“组织的科学”^⑤,主要偏向科学的思维、科学的工具和科学方法的应用。例如强调运用统计分析、定量分析等科学工具去规划、测量和控制慈善工作进程,去探究慈善发展的效果^⑥。再如公益创投的兴起就是因为看到传统慈善捐赠的低效,主张将风险投资引入解决社会痛点问题的市场,认为借助风险投资的标准,特别是投后管理对项目方的提携与监督,可以更好的解决社会问题^⑦。

正如科学慈善这一概念本身所宣示的,它所倡导的正是将科学精神注入慈善,以提升慈善管理的科学性和提高慈善资源的利用效率。概言之,可以从四个层面理解科学慈善中的“科学”:一是在目的上,强调慈善是一场社会正义运动,是建构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二是在主体上,认为慈善应不止于善念,而是公民的一种社会责任;三是在方法上,主张从模糊的扶贫济困转向有针对性的帮

扶和对科学管理工具的应用;四是在结果上,特别关注慈善服务的社会效益,积极倡导有效的慈善。

不难看出,科学慈善所宣扬的“科学”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体现。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理性包含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前者体现为在社会行动中以合理的方式去实践信念、追求价值,后者注重采取有效手段去达致目的,注重效率以及要求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⑧。理性的真正内涵是人文与科学的统一^⑨。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慈善运动所倡导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理性,是将慈善看作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并且试图不断创新管理工具以提升慈善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科学慈善的推动之下,利用科学手段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⑩,使慈善获得了以公平正义的方式进行财富分配、保障个人权利的功能^⑪,有效突破了传统慈善力量薄弱、领域单一、绩效不足等问题。相应地,中西方慈善事业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型发展特征。

在西方,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已经有少量名目不等的私人基金会。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批制度完备的大型基金会,其中不少以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为目标,强调向问题的根源开刀,将传统的相对零散的捐赠变为合理化、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公益事业,把探索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辅助弱势群体更多地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要诉诸仁爱 and 利他主义,对现代慈善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⑫。在中国,科学慈善的观念于清末民初时期传入,对传统慈善事业带来巨大冲击,开启了传统慈善向近现代慈善转型的序幕^⑬。其突出体现是,受西方观念和实践的影响,为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公益观念开始广被讨论,“慈善公益”与“公益慈善”概念相继出现,慈善的外延扩大,慈善机构也开始注重内部治理和规范化建设,开始向职业化和专业化方向迈进。

总之,科学慈善在价值与实践层面有明确的超越传统慈善的主张,在其推动下,慈善事业开启了近代征程。然而,尽管科学慈善反复宣称倡导科学不等于抛弃慈善的道德性,但是在实际发展中,科学慈善因在发展之初就致力于抑制慈善冲动而被批评。不仅如此,科学慈善在解决社会问题上仍然乏力,只能发挥矫正社会失调的作用,远远不能实现其既定目标。

三、数字赋能与科学慈善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获得大发展,数据成为新的驱动因素并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生产生活^①。数字技术也为科学慈善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为科学慈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

21世纪初期,数字赋能慈善事业在全球正式启航。2010年,受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有130年历史的全球著名的联合劝募组织——联合之路开始数字化改革。2012年,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美国首个全国性慈善日“给予星期二”(Giving Tuesday)拉开大幕,将传统的捐赠地点拓展到网络,随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慈善节日。在中国,2015年腾讯“99公益日”首次上线,该活动旨在通过移动互联网化、社交化等创新手段,发动网民通过小额现金捐赠、步数捐赠等多种方式参与公益。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99公益日”已经成为中国最富影响力的公益筹款节日。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慈善领域产生了持续且重大的影响,全方位地改变着慈善生态。整体而言,近二十年的数字赋能使慈善事业在目标、参与主体、参与方式、施助者与受助者关系、慈善绩效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慈善目标多元化、慈善主体大众化、慈善服务精准化和慈善产出有效化等新现象。

慈善目标多元化。与传统慈善和早期的科学慈善相比,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广泛传播使慈善主体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对救助对象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范围不断扩大,也使基于不同偏好和目的的慈善参与成为可能。作为一种结果,慈善事业的领域从传统的宗教、教育、医疗延伸至养老、环境保护、心理健康、乡村振兴等领域,极大拓展了慈善事业的发展空间,也使慈善的功能不断向公益领域延伸。

慈善主体大众化。数字技术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突破时空限制且直接面向公众的沟通渠道,有效激发了公众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吸引了大批个体捐赠者。不仅如此,数字技术使虚拟物品的捐赠成为现实^②,推动慈善的参与方式从传统的捐款、捐物、志愿服务扩展丰富为捐微笑、

捐积分、捐阅读、捐步数和捐蚂蚁能量等多种方式,使更多人的参与成为可能。在中国,数字赋能推动慈善主体大众化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据报道,2016年以来民政部先后遴选出3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开启了“慈善+互联网”赛道,据统计,截至2022年这些平台已累计带动超过510亿人次的网民参与,募集善款超过350亿元^③。

慈善服务精准化。数字技术应用使慈善信息的呈现方式和覆盖领域更加多元化,而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则实现了供需两端信息与资源的精准匹配,使慈善组织的灵活性、精准服务能力和应急能力得以提升。如2019年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依托大数据、互联网开发出全国首个“融慈善”应用场景,通过“线上点单线下办”的模式,打破了部门壁垒、区域限制和门户之争等“传统边界”,实现了求助群众足不出户、慈善组织认领救助任务后上门进行救助的新型服务对接模式^④。

慈善产出有效化。传统慈善在“勿以善小而不为”的理念引导下,强调无私奉献、不计成本地开展慈善活动,很少思考如何使用有限的慈善资源实现最大的慈善效果,科学慈善运动逐渐改变了这一状况。而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则可以基于多维度和多渠道的数据精准对接慈善需求与供给、基于多类别的大数据分析工具在线评估慈善项目的未来收益、基于网络社交平台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从而帮助慈善主体更好地研判受助群体的真实需求和慈善产出的有效性,以做出更加高效的决策。在线公益评估组织GiveWell就通过比较慈善机构和评估它们每捐赠一美元能产生的效果来衡量成本收益,实现了对捐赠者进行精准推荐和帮助他们制定有效决策的目的。中国慈善项目的有效性评估实践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许多地方正通过互联网等技术为捐赠人分析、发现、推荐具有更高社会回报的捐赠机会。

综上,数字技术发展推动慈善事业进入数字赋能新阶段,进一步促进了科学慈善的发展。数字技术之所以能够将多元化的科学因子注入慈善事业,除了得益于科学慈善的长期推动和积累以外,还与数字技术的在线化、移动化、透明化、广泛化、数据化等特征和优势密切相关。

首先,互联网的在线特征使慈善行为不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有助于人们将“冲动捐赠”的意

愿在短时间内转化成真正的慈善行为^⑤,促成了线上捐款和志愿服务等慈善行为的发生,而移动终端的普及和应用又为慈善信息的广泛传播和即时性慈善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载体^⑥。

其次,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不可篡改等特征,此类技术的应用为慈善事业的信任构建带来了更多可能^⑦。除此之外,数字平台也推动了在线信息披露和财务监管^⑧,有效提升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使捐赠者更有信心。例如,浙江省的“浙里捐赠”数字平台运用区块链技术来打消捐赠人对善款流向的顾虑,上线1个多月后收到捐赠金额12.2亿元,累计超过405万人次接受捐赠^⑨。

再次,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加速了信息生产工具和呈现载体的创新,改变了社会公众与信息的链接方式,即时性和广泛性成为当下信息传播的显著特征。在此情境中,慈善主体的参与范围与渠道不断扩大且能够进行互动社交,慈善信息与资源也能够得到精准匹配。借助数字技术的这一特征所开展的线上募捐活动往往能够取得好成效。腾讯公益发起的“99公益日”自上线以来参与者众多,2022年活动期间收获了5816万人次、超3000家机构的参与和33亿元的善款^⑩。

最后,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人、物、组织的活动被各种网络系统、传感器等智能终端转换为抽象的数据,使慈善组织应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进行数据储存、挖掘和研判成为现实,也使依据数据分析完成传统慈善难以提供的服务和更有预见性地进行资源衔接成为可能^⑪。当前,数字技术的这些优势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在线志愿服务、慈善行业和市场分析、灾情趋势预测和舆情预判等领域,如杭州市民政局的公益项目“慈善杭州”便是依托杭州城市大脑,通过“线上一键直达”来帮助社会力量对接慈善资源和帮助困难群体。

总之,数字技术为慈善事业的科学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有效推动了科学慈善的发展,使慈善能够服务于更多的公益目标,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慈善,也使慈善管理更加精细化和高效化。然而,随着数字技术赋能的不断加强,科学慈善早期面临的批评不但没有被消解,反而在某些方面被强化。与其他领域中人们对数字技术所持的警惕态度相同,慈善事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否会

导致慈善对人本身的忽视和对技术的依赖,是否会使慈善的人道主义属性日渐弱化等,逐渐成为了广受关注的问题。

四、数字赋能面临的问题与科学慈善的限度

数字技术在慈善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慈善事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暴露出不足。2018年微信群中出现的向基督徒骗捐事件、2019年澳大利亚慈善机构Smith Family遭遇网络攻击导致捐赠人信息泄露等都表明,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肯定其赋能慈善的成效时也需要关注其局限性。下面从数字鸿沟、数字失信、数字垄断、数字冷漠和数字化带来的非理性参与等五个方面讨论数字赋能慈善所面临的问题。

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主要形式有数字接入鸿沟、数字能力鸿沟和数字产出鸿沟,在慈善领域体现为:一是当慈善活动的场域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缺乏数字接入工具的慈善主体由于面临更大的信息搜寻成本,难以形成捐赠意愿和捐赠决策^⑫;二是一些不具备数字化转型基础的慈善组织无力跟上时代潮流,或者被数字化浪潮裹挟前进,甚至出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数字化形式主义问题;三是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费支持的慈善组织难以在互联网资源获取、知识与信息管理、在线数据分析、互联网协作等方面与有实力的慈善组织进行平等对话,容易在数字产出上落后于大型慈善组织^⑬。《中国公益组织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第八次调研报告》显示,2021年仅有39.56%的慈善组织发起过互联网公开募捐,这反映出慈善组织存在数字化水平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可能引致多种发展不平衡问题。

数字失信。数字失信通常起源于不当的数据收集与处理^⑭,是引发消费者对数据泄露和隐私侵犯担忧的重要原因^⑮。数字技术在慈善领域产生的数字信任问题有多种表现:其一,“互联网+慈善”的监管相对滞后,技术与制度的异步困境导致数字赋能慈善面临巨大资金风险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其二,慈善组织在数字化转型中普遍面临人员与资金困境,专业水平相对有限,容易出现数据泄露、平台信息审核不严等问题,并导致捐赠者对慈善事业妥善应用数字技术的信任产生波动;其三,数字化场域中的捐赠者和受助者之间存在明

显的信息不对称,骗捐诈捐等事件时有发生,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时常受到冲击。

数字垄断。数字垄断是因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马太效应逐渐显现而引起的资源加速向头部平台集中的现象^⑧。慈善领域的数字垄断主要体现为数字权力和资源壁垒。一些率先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大型慈善组织往往通过先发优势获得更多的数据资源和数字权力^⑨,在慈善信息生产、资源获取和分配等方面拥有一定的主导权。与此同时,由于慈善组织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协作机制不健全,大量慈善资源无法精准有效地配置给规模小、深耕基层的慈善组织,“资源孤岛”现象普遍存在。

数字冷漠。数字冷漠是指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的服务生产和递送所具有的机械化、程式化、非个性化和非情感性倾向^⑩。数字技术在为慈善主体提供便利和精准服务的同时,将每个受助者转换为带有标签的数字或数据,导致慈善主体在需求评估、项目管理、服务开展等各方面都依赖于此,极大地降低了捐赠者的临场感水平,忽视了对受助者个性化需求的探索,极易消解慈善应有的情感气息和引起“同情疲劳”问题^⑪。

非理性参与。非理性参与是指在数字化场域中,个体十分容易被卷入到某些社会热点问题,并且容易受群体情绪支配而难以形成理性思考^⑫。同样,受数字信息的裹挟,个体也容易做出非理性决策。“罗一笑事件”中的父亲没有通过常规的途径进行募款,而是在社交平台上“卖文”筹资,通过设置“如果多转发一次这篇文章,便会为笑笑的治疗筹款多增一元钱”等具有“煽动性”的标语,调动了社会公众的捐款积极性,在短时间内就有近11万人打赏。这一事件鲜明地体现了数字技术介入慈善活动所引发的非理性参与问题。

以上种种问题暴露了科学慈善的限度,而这种限度的形成与数字技术本身的局限性、数字技术使用主体的局限性和制度的局限性密切相关。首先,数字技术不能替代情感表达,难以呈现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文化伦理、自然情感、复杂动机等因素。不但如此,数字技术也无法达至绝对理性,不可能真正为慈善主体做出所谓的理性决策^⑬。其次,应用主体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存在不足,而这种不足最终体现为应用主体在使用慈善数字平台和数据时容易出现偏差,产生“数字内卷”、传播错误

信息、做出非理性决策等问题。最后,制度与数字技术之间存在异步困境,数字技术日新月异而制度具有滞后性^⑭,制订预见性制度对决策者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透过科学慈善的限度不难看到科学精神与人道主义之间存在张力。数字技术赋能慈善是科学慈善在数字时代的新发展,换言之,正是科学慈善在一个多世纪中的倡导和实践使得科学精神日益深入人心,使慈善拥抱数字技术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然而,正如科学慈善早期所面临的批评一样,慈善毕竟不是一门科学,过度强调慈善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意义和强调在慈善中应用科学工具,不仅无益于慈善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反而会减损它的道德意义。从数字赋能慈善中出现的数字鸿沟、数字失信、数字冷漠等问题来看,数字赋能慈善并未将慈善从改良社会的边缘地位中解救出来,科学精神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张力在科学慈善中非但没有被消除,反而更为突出。

具体来说,首先,慈善是一种民间社会的道德活动,主要源自参与主体的道德自觉。这意味着,无论何种形式的慈善,无论善举大小,也无论善行是否产生积极效果,慈善本身就具有积极的道德意义和重要的社会价值。而科学慈善强调慈善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试图将慈善改造成为一种目的明确、高效且具有规模性的社会活动,使其成为一种公民责任和义务,这与公众对慈善的传统认知并不相符,容易导致部分慈善组织和个体施助者在被重新定位的慈善中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从而对慈善产生认同危机。

其次,慈善是一种共同体活动,慈善主体在慈善活动中传递情感、共同营造社区氛围、创造社会资本。科学慈善尤其是数字赋能慈善使慈善活动跨越了时空限制,扩大了参与领域和参与范围,但与此同时拉大了慈善主体间的距离,慈善的过程被极大压缩甚至演化为一种“指尖”行为,慈善建构社会关系和共同体的意义因此被极大地削弱。

最后,慈善是一种信任建构活动,其核心功能是关爱和救助社会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建立生活信心和社会信任。科学慈善扩大了慈善的内涵与外延,赋予其改造社会的使命,导致不少人对慈善能否实现这一远大目标产生怀疑,并对慈善与政府公益的边界产生疑惑。数字赋能慈

善阶段出现的慈善失范和非理性参与等现象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慈善失去信任,这无疑与慈善建构社会价值的初衷背道而驰。

综上,在数字技术长驱直入的当今时代,特别需要警惕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慈善事业所产生的风险,需要对科学慈善的限度有清醒认识。在慈善中植入科学精神具有历史合理性,但是慈善毕竟不是科学,不应将数字技术应用视作慈善事业的目的,而是要合理利用数字技术去实现慈善事业的本质功能,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规制数字技术应用的潜在和现实风险。

五、走向数智慈善： 找寻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的平衡点

在从传统慈善到科学慈善的历史演进中,可以看到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的此消彼长。传统慈善主要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人们出于善念或道德自觉开展扶贫济困等慈善活动,基本无涉科学技术。科学慈善建立在反思传统慈善的基础之上,认为应赋予慈善新目标,并且要通过科学管理来提升慈善效能。数字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慈善的发展,但也对慈善事业以人为本、关爱人、尊重人的本质属性造成了冲击。在数字化高歌猛进的今天,十分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定位和发展新时代的慈善事业。

近几年,慈善在第三次分配和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这要求我们既要将慈善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发挥慈善在塑造道德、建设共同体和促进社会信任中的作用,又要重视慈善的工具意义,通过它来调动社会慈善资源以实现更高层次的目标。这意味着需要继续发挥科学慈善的功能,同时又要超越其局限性。要达到此目标,首先要进行理念上的革新:一是要继续宣扬科学慈善理念,树立“大慈善”观,积极发挥慈善在改良社会中的作用,同时采取新科技手段提升慈善管理效能;二是要牢牢把握慈善的核心要义,积极发展“小慈善”,重视人道主义在引领价值观念和促进社会团结中的作用。简言之,需要探索建立一种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相平衡的新慈善。

当前,随着数据处理能力和社会技术的革新升级,具有新算法和运算能力的人工智能得到飞

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人工智能时代^③。与传统“冰冷”的数字技术不同,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高度的类人化和拟人化特征,会思考、能学习。此类新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慈善事业的进一步转型发展提供了想象空间。基于此,本文将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相平衡的慈善称为“数智慈善”(图1),认为它是科学慈善转型发展的可能方向。数智慈善是指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有智慧的慈善,是将数字技术服务于慈善的价值目标,通过应用数字技术使慈善更好地服务于受助者,使受助者能够在受帮扶的过程中获得关爱、尊严和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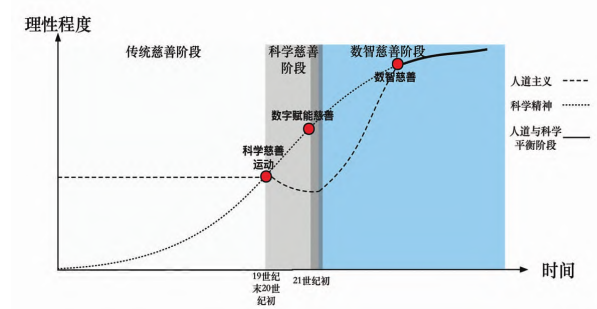


图1 慈善事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一方面,科学慈善的理念和做法还没有完全被接受,许多慈善组织还处于比较传统的状态,数字赋能也处于初步阶段,慈善事业的数字化水平整体不高;另一方面,科学慈善尤其是数字赋能的弊端已经在多方面暴露出来,慈善事业面临公信力危机和信心危机。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对慈善事业抱有很高的期待,积极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在这种背景下,迫切需要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契机,一边补课,一边创新,推进慈善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操作层面来看,当前促进科学慈善向数智慈善转型发展需要重点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技术应用与制度建设的关系。“技术”追求效率和结果,“制度”是对人的价值和公共性的保障,技术与制度之间是互嵌与互构的关系^④。科学慈善使慈善事业不断延伸空间,覆盖了许多传统慈善无法触及的社会关系(如个人网络求助),也带来慈善活动中诸多关系的变化,这要求管理部门及时进行政策更新以应对新的管理需求。慈善领域中数字鸿沟、数字失信等问题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发展的滞后性,也对提

升政策能力提出了要求。

值得期待的是,当前人类社会已经逐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不仅是数字技术,而且是治理工具,具有超强的深度学习能力,能够为及时制定和优化政策提供技术支撑,为打破技术与制度的二元困境提供了空间。慈善事业的管理部门需要在既有数字技术应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技术辅助决策的功能,加强对慈善活动各方面信息的收集、分析和研判,针对慈善数字化转型已经导致和可能引发的问题及时做出政策规定,充分发挥制度引导技术、制度规制技术的作用。当前尤为重要,一是对慈善的角色和功能进行清晰定位,明确“大慈善”中的“小慈善”与公益的关系、慈善与政府职能的关系以及民间慈善的角色与功能;二是针对数字赋能慈善中已经暴露出的问题作出合理的政策安排,同时加强对人工智能时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前瞻性制度设计,如为公众和慈善组织提供均等的基本数字接入机会、要求慈善募捐平台设置捐赠冷静期、加强对个人网络求助的规范管理。

其次,要处理好过程管理与结果评价的关系。科学慈善由于过于重视技术而忽视施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情感联结,特别是在数字赋能慈善时期,施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距离被拉大,二者之间的关系被转化为各种数字和数据,慈善应有的情感特征被不断弱化。慈善既是过程也是结果,不能仅看过程不注重产出,也不能过于重视产出而忽视慈善在主体间传递社会情感和建构社会意义的过程。在迈向数智慈善的进程中,一方面需要延续科学慈善对科学精神的重视,保持对慈善绩效的追求,加强科学评估;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慈善活动过程的关注,不仅要加强对过程的科学管理,更重要的是要使慈善活动过程能够发挥共创社会价值的作用。就价值共创而言,一是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创设丰富的慈善主体线上交互空间和多种慈善活动场域,塑造更强的临场感,从而增强慈善主体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联结;二是不可忽视线下慈善尤其是社区慈善所具有的过程性意义。线下慈善的独特优势是慈善主体能够获得高体验感,能够通过慈善活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无论数字技术如何发展,线下慈善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当前,迫切需要推动线下社区慈善的发展,积极发挥

社区慈善在团结群众、塑造共同体和传递正向社会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最后,要处理好集中化与多元化的关系。传统慈善是相对分散和多元的,但科学慈善尤其是数字赋能时期的慈善却出现了明显的集中化和垄断化倾向,慈善资源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先天条件优越和数字能力强的慈善组织手中,中小规模慈善机构和草根慈善的空间受到挤压。因而,数智慈善阶段虽然仍需要持续推进慈善的组织化、专业化和高效化,但不可忽视草根性、自发性慈善力量的作用,两方面需要齐头并进。这一方面要求慈善事业管理部门重视慈善组织的总体结构布局,对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的功能进行清晰定位,建构布局合理的新型慈善组织体系,同时要促进不同类型慈善组织之间的资源流动,建立慈善资源链和慈善共同体。当前特别需要为慈善组织提供综合性的资源对接平台,并且,为了实现有效的资源链接,需要为慈善组织数字化转型提供共性技术支持。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改变对慈善事业发展的评价标准,不宜将慈善绩效简化为各类数字和数据,而是要重视慈善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要重视分散的、微小的利他行为在建构社会价值观、塑造公民道德观、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对慈善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形成与科学慈善上百年中累积的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有直接关系。随着数字技术应用的深化,慈善事业的工具意义愈发凸显,对“精度”的追求日益超越对“温度”的追求,与此相伴的是慈善的人道主义色彩渐趋淡化。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慈善事业在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间实现平衡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当前迫切需要推动科学慈善向数智慈善转型,在借助数字技术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始终将“人”置于慈善事业的核心位置。

注释:

①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②Miriam Ticktin, “Trans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43, no.1 (October 2014), pp.273~289.

③周中之:《共同富裕的慈善伦理支持》,《求索》2022

年第1期。

④黄家瑶:《中西方慈善文化的渊源比较及启示》,《学术界》2008年第4期。

⑤周秋光、李华文:《中国慈善的传统与现代转型》,《思想战线》2020年第2期。

⑥金锦萍:《科学慈善运动与慈善的转型》,《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9年第2期。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㊀㊁㊂㊃㊄㊅㊆㊇㊈㊉㊊㊋㊌㊍㊎㊏㊐㊑㊒㊓㊔㊕㊖㊗㊘㊙㊚㊛㊜㊝㊞㊟㊠㊡㊢㊣㊤㊥㊦㊧㊨㊩㊪㊫㊬㊭㊮㊯㊰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㊀㊁㊂㊃㊄㊅㊆㊇㊈㊉㊊㊋㊌㊍㊎㊏㊐㊑㊒㊓㊔㊕㊖㊗㊘㊙㊚㊛㊜㊝㊞㊟㊠㊡㊢㊣㊤㊥㊦㊧㊨㊩㊪㊫㊬㊭㊮㊯㊰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㊀㊁㊂㊃㊄㊅㊆㊇㊈㊉㊊㊋㊌㊍㊎㊏㊐㊑㊒㊓㊔㊕㊖㊗㊘㊙㊚㊛㊜㊝㊞㊟㊠㊡㊢㊣㊤㊥㊦㊧㊨㊩㊪㊫㊬㊭㊮㊯㊰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⑨TheoSchuyt, "Philanthropy i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A Challenging Promis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vol.76, no.4 (December 2010), pp.774~789.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㊀㊁㊂㊃㊄㊅㊆㊇㊈㊉㊊㊋㊌㊍㊎㊏㊐㊑㊒㊓㊔㊕㊖㊗㊘㊙㊚㊛㊜㊝㊞㊟㊠㊡㊢㊣㊤㊥㊦㊧㊨㊩㊪㊫㊬㊭㊮㊯㊰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⑪朱健刚、刘文文:《“科学公益”的社会建构:模型、话语与范例》,《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⑫牛可:《美国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科学公益》,《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

⑬Ben Nanfeng Luo, Lu Xing, Rongrong Zhang, et al, "Different Form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Different Effects: A Multilevel Analysis",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 vol.29, no.4 (October 2020), pp.748~762.

⑭Rebecca Tekula, Kirsten Anderse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Nonprofit, and Private Facilitation of the Impact Investing Marketplace",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vol.42, no.1 (January 2019), pp.142~161.

⑮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15页。

⑯杨国荣:《现代化过程的科学向度与人文之维》,《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⑰周秋光:《民国时期社会慈善事业研究刍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⑱郁建兴、高翔、王诗宗等:《数字时代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革命》,《管理世界》2023年第1期。

⑲Chundong Zheng, Yanan Cao, Yi Wu, et al, "Do Virtual Goods Entice More Online Donations? Perspectives of Mental Imagery and Project Appeal",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vol.60, no.2 (March 2023), pp.1~13.

㉑人民日报客户端湖北频道:《我国互联网公益筹款规模8年增长4倍,筹款超350亿元》, <https://sdwx.iqilu.com/w/article/YS0yMS0xNDY1MTc2Mw.html>, 2023年5月22日。

㉒人民融媒体:《浙江常山:“融慈善”数字化应用场景,实现群众“一键求助”》,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3103352281201116&wfr=spider&for=pc>, 2022年9月5日。

㉓Roger Bennett, "Impulsive Donation Decisions during Online Browsing of Charity Websites",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Review, vol.8, no.2-3 (March-June 2009), pp.116~134.

㉔赵文聘、徐家良:《制度性组织、新纽带与再嵌入:网络公益慈善信任形成机制创新》,《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㉕蔡明章、王林、吴江:《区块链技术在互联网公益众筹领域的应用研究》,《图书与情报》2020年第2期。

㉖Joannie Tremblay-Boir, Aseem Prakash, "Accountability.org: Online Disclosures by US Nonprofit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vol.26, no.2 (April 2015), pp.693~719.

㉗光明网:《让慈善捐赠更便利更规范》, <https://m.gmw.cn/baijia/2022-08/01/35922685.html>, 2022年8月1日。

㉘方德瑞信:《2022年99公益日筹款数据盘点(整合版)》, <https://mp.weixin.qq.com/s/7tzkIOq3Okp8OrfrqwKFNA>, 2022年10月28日。

㉙刁宏宇、吴选红:《基于大数据的慈善资源精准衔接探讨》,《探求》2019年第4期。

㉚Jaclyn Piatak, Nathan Dietz, Brice McKeever, "Bridging or Deepen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Internet Access on Formal and Informal Volunteer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48, no.2_suppl (April 2019), pp.123~150.

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㊀㊁㊂㊃㊄㊅㊆㊇㊈㊉㊊㊋㊌㊍㊎㊏㊐㊑㊒㊓㊔㊕㊖㊗㊘㊙㊚㊛㊜㊝㊞㊟㊠㊡㊢㊣㊤㊥㊦㊧㊨㊩㊪㊫㊬㊭㊮㊯㊰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㉜杨棚、连志凤:《企业数字责任、数字信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软科学》2023年第1期。

㉝Young Min Baek, Eun-mee Kim, Young Bae, "My Privacy is Okay, but Theirs is Endangered: Why Comparative Optimism Matters in Online Privacy Concer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31 (February 2014), pp.48~56.

㉞张蕴萍、栾菁:《数字经济平台垄断治理策略研究》,《经济问题》2021年第12期。

㉟易艳阳:《社区老年服务数字生态中的风险及治理》,《电子政务》2022年第4期。

㊱叶晓君:《技术神话光环下的中国慈善公益》,《文化纵横》2018年第5期。

㊲秦璇、陈曦:《偶像失格、群体非理性和道德恐慌:粉丝群体互相攻击中的举报策略与诱因》,《新闻记者》2021年第10期。

㊳郁建兴、樊靓:《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及其限度——以杭州城市大脑为分析对象》,《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年第1期。

㊴邱泽奇:《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社会发展研究》2018年第4期。

㊵何哲:《通向人工智能时代——兼论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方向及对中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借鉴》,《电子政务》2016年第12期。

㊶张家才、张晓杰:《数字政府建设:技术与制度的互嵌与重构》,《行政科学论坛》2023年第1期。

责任编辑 毕然

Key words: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rial; times of change; informal control; social adjustment mechanism

The Tension and Debate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62)

Wang Guoqin¹, Wang Daiyue²

(1. *Zheji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2. *The University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Ide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as its own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boundaries. Most of these schools and their propositions originate from or belong to the Marxist tradition.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clarify the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 and its basic research paradigm.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the internal tension and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tructure-agent” “state-society” and “criticism-construction” in its evolution process.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questions it faces and the defenses it has made, such as how to read ideology from discourse, how to get rid of the explanation cycle of “the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lso belongs to ideology”. Ide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as been developing in these adjustments and defenses for a long time, and should eventually return to Marxist materialism to determine a more appropriate methodological basis.

Key words: ideology; discourse analysis; structure-agent; state-society; criticism-constructio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 (71)

Zhou Jun, Liu Chenyue, Zhou Yufang

(*Yingxian Charity Colleg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to the field of philanthropy makes it necessary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arianism” and “scientific spirit” in the philanthropy. As a response to the insufficient scientific spirit of traditional philanthropy, scientific philanthropy promoted to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progress and strengthe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from both values and practices, injecting some scientific factors into the philanthropy.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empowered the philanthropy comprehensively, greatly expanding its field and functions and improving its efficiency, bringing scientific philanthropy into a golden age. However, scientific philanthropy places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neglects the “temperature” that philanthropy should have, leading to issues such as digital divide, digital dishonesty, and digital indifference, which to some extent dilutes the humanitarian color of philanthropy.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scientific philanthropy to transform into a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Philanthropy” that seeks a balance between humanitarianism and scientific spirit. In the stage of moving toward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charity, it is necessary to handle reasonabl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process management and result evalua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humanism; scientific spirit; scientific philanthropy;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philanthropy

Traditional Security, Pension Insurance and Rural Residents’ Concerns about Elderly Care Risks (80)

Xu Qiang¹, Zhang Kaiyun², Zhou Yang³

(1,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3.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20*)

Abstract: Concerns about elderly care risks ar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life, which is an individual level of concern about the expected difficulties faced by elderly care. The article uses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pension insurance on rural residents’ concerns about elderly care risks based on 3629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from 24 counties in 8 provinces across China in 2023.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72.6% of rural residents worrying about their own elderly care issues, which is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elderly care concerns. 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pension insuranc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lderly care concerns of rural residents. Among them, rural residents with poorer health conditions, fewer children, less household savings, and less convenient community transportation have higher levels of elderly care concerns. The older the age, the fewer the number of siblings and people in western regions have lower levels of elderly care concerns. At the level of pension insurance, the elderly care concerns of the insured group are relatively low. The higher the fairness, expectations,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system, the lower the elderly care concerns of rural residents. Therefore, the alleviation of elderly care concerns among rural residents requires at-

主 管：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 办：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辑：《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
出 版：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
国内统一刊号：CN33-1149 / C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2253
国内发行：浙江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邮发代号：32-102
国外发行代号：BM4573
定 价：18.00元

网 址：<https://www.zjskw.gov.cn>
投稿网页：<https://www.zjsh.cbpt.cnki.net>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浙工商广发Z-026号
印 刷：杭州供销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年8月15日
地 址：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51-1号省行政中心二号院
电 话：0571-87053204
邮 编：310003

ISSN 1004-2253

